

元代以前皖江流域佛教发展的时空特征 及其原因初探

——以寺院为中心¹

罗冰，周晓光

【摘要】：皖江流域是中国最早有佛法流布的地区之一，也是佛教地方化进程的重要区域。元代以前，皖江流域佛寺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分布态势从东汉三国时期的“两点一面”，发展到南北朝时期的“大分布、小聚集”；从隋唐五代时期的寺院建设的“网式普兴”发展到两宋时期的新寺多鳞集于州城大邑，额寺多汇聚于传统佛教胜区的局面。皖江流域特殊的自然、政治、地理、交通、经济等条件是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佛教地方化；皖江流域；寺院；时空分布

【中图分类号】：K2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6-0099-10

佛教入华后，其在适应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过程中逐渐被中国化。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佛教传入某个区域，就必须在遵循佛法根本精神的同时，随不同区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首先完成地方化。^[1]而佛教的地方化必然受到一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寺院作为佛教重要的物质存在，其分布状况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最为直接。因而，研究寺院在不同区域的地理分布特征是探究佛教地方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学界有关佛寺地理分布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2]但仍有一些重要区域缺乏深入的探究，皖江流域就是一例。^[3]

学术界关于皖江流域的范围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程必定、赵崔莉、张绪、王艳红、张阳等均探讨过这一问题，学者们的观点虽然不大相同，但都认为皖江流域即指现代安徽省的沿江地区。综合学人的观点，同时从流域是一个以河流为中心的人—地—水相互作用的复合系统，是有着明显边界的自然区域，同时又是历史人类发展各要素集聚的区域的这一基本认识出发，笔者认为：皖江流域应该是以自然区域为基础、以政区为表征的特定区域。由此，根据不同流域之间是以分水岭来划分的地理学概念，皖江流域的范围是北部以江淮分水岭中段为界限，南部以长江流域与钱塘江流域的分水岭——黄山山脉为界限的位于现代安徽省辖区的狭长区域。大体上包括今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等市的全部辖区，以及合肥（不含长丰）、滁州（不含凤阳、定远、天长、明光）、宣城（不含绩溪）、六安（仅包括舒城县）、黄山（仅包括黄山区）等市的部分辖区。由于较为特殊的地理、经济和政治等原因，元代以前的皖江流域不仅是中国文化中心南渐的唯一完整序列的核心区域之一^[4]，而且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代表性区域之一。研究这一区域的佛寺地理分布状况对于深入探讨佛教的地方化进程具有一定的标本作用。本文拟采用历史宗教地理学的方法^[5]，通过耙梳皖江流域的地方志等资料^[6]，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对元代以前皖江流域寺院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初步探讨形成这些特征的主要因素。不当之处，尚祈正之。

一、各历史时期皖江流域寺院的时空分布状况

¹【作者简介】：罗冰，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安徽合肥，230039；铜陵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安徽铜陵，244000。周晓光，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合肥，23003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地理学视阈下的徽州佛教研究”（16BZS033）

1. 东汉三国时期

东汉明帝时期，佛法通过迁移扩散（relocation diffusion）^[7]的方式流入院江流域。据《后汉书》记载：永平十三年奉佛的楚王英因“逆谋”被“徙丹阳泾县”^[8]，这一偶然事件成为域内佛教传播的滥觞，泾县也成为长江流域最早有佛法流布的地区之一^[9]，佛寺也渐次出现^[10]。据学者考证，东汉时期有 52 个县建有寺院，共计 62 所^[11]，泾县的佛寺数量已经远超全国的平均水平，成为当时皖江流域内唯一的佛教重镇。三国时期，皖江流域新建佛寺的数量和分布地区明显增多（见表 1）。从时间上看，佛寺大多兴建于赤乌（238-251 年）年间。从地区来看，皖江北岸共建佛寺 5 所，主要分布在今合肥、来安、全椒以及和县等地区。而南岸的新寺则集中于今当涂地区，共有 4 所。整体来看，至三国末期皖江流域寺院分布明显呈现出佛寺的密集区与“蛮区”^[12]并存的局面。寺院主要分布在东部毗邻今南京地区的皖江两岸，以及合肥、泾县地区，而其他区域是空白一片。从寺院分布的发展态势来看，寺院由东汉时期的泾县一点，发展到三国时期的两点一面。点主要指合、泾两县，共建寺 3 所。面主要指今来安、全椒、和县以及当涂一线，这一区域共新建寺 8 所，占到本时期全部新建寺院的 72.7%。从寺院的区域分布来看，东汉三国时期皖江流域佛教还处于萌芽状态。

2. 两晋南北朝时期

两晋南北朝时期，皖江流域的佛寺建设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共新建寺院 75 所（见表 1）。以现代政区来看，大多数县级政区均有寺院分布，这也意味着佛教文化在皖江流域大体上实现了全覆盖。原有“蛮区”的佛寺也开始次第出现，但分布仍然很不平衡。本时期域内出现了三个佛寺密集区^[13]依次是：“泾县密集区”，位于今南陵—泾县—宣城—广德一线^[14]，共建寺 22 所，占比 29.3%；“当涂密集区”，位于今和县—繁昌一线的皖江两岸地区，共建寺 15 所，占比 20%；“宿松密集区”，位于今宿松—太湖—潜山—怀宁一线，共建寺 21 所，占比 28%。余下的地区中，合肥附近地区佛寺也较多，数量为 5 所。而今滁州、池州以及黄山附近地区寺院还处于零星分布的状态。总体而言，两晋南北朝时期皖江流域佛寺分布大体呈现了一个“大分布、小聚集”的特征，呈现了由远江地区到近江地区、东西两端同时发展的态势，皖江流域佛教版图的扩容速度明显加快。

表 1 文献所见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皖江流域新建佛寺分布统计表（单位：所）

地区	市、县、区	东汉	三国	两晋	南北朝
合肥地区（8）	合肥（5）	/	1	3	1
	肥东（1）	/	/	/	1
	巢湖（2）	/	/	/	2
安庆地区（24）	宿松（7）	/	/	4	3
	太湖（5）	/	/	1	4
	潜山（5）	/	/	3	2
	怀宁（4）	/	/	/	4
	桐城（2）	/	/	1	1
	望江（1）	/	/	/	1
滁州地区（5）	全椒（3）	/	2	/	1
	滁州（1）	/	/	/	1
	来安（1）	/	1	/	/
马鞍山地区（15）	和县（3）	/	2	1	/
	当涂（12）	/	4	3	5
芜湖地区（11）	南陵（5）	/	/	1	4

	芜湖 (3)	/	/	3	/
	繁昌 (3)	/	/	1	2
铜陵地区 (2)	枞阳 (2)	/	/	2	/
池州地区 (4)	青阳 (2)	/	/	1	1
	东至 (1)	/	/	/	1
	石台 (1)	/	/	/	1
宣城地区 (17)	泾县 (8)	2	/	3	3
	宣城 (5)	/	/	2	3
	郎溪 (2)	/	/	/	2
	广德 (2)	/	/	1	1
黄山地区 (1)	黄山区 (1)	/	/	/	1
	合计	2	10	30	45

说明：（1）由于本文涉及的时间跨度较长，而佛寺的兴衰情况又较为复杂且史料缺乏，为了较为准确的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寺院的数量及其分布情况，一般以寺院兴建的时期为基本标准来统计其数量及分布。（2）由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政区变化频繁，为了直观的展现这一时期寺院的分布情况，本表寺院所处地理位置用现代政区标明。（3）本文标识的寺院所在政区，均参考《安徽省志·建置沿革志》（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 1999 年版）和《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年版）。

表 2 文献所见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皖江流域新建佛寺分布统计表（单位：所）

道	州	县	寺院数
江南西道 (182)	宣州 (119)	南陵	25
		当涂 (含采石军)	20
		宣城	16
		广德	16
		宁国	16
	池州 (63)	泾县	11
		太平	8
		旌德	7
		青阳 (含九华山)	33 (20)
		秋浦	13
	舒州 (47)	至德	13
		石埭	4
		宿松	17
		太湖	14
		怀宁	11
淮南道 (111)	庐州 (34)	望江	3
		同安	2
		合肥	15
		巢县	11

	庐江	6
	慎县	1
	舒城	1
	历阳	9
和州（17）	含山	7
	乌江	1
	清流	6
滁州（13）	全椒	5
	永阳	2

说明：本表采用唐中期政区（755 年），参见《安徽省志·建置沿革志》，方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8-289 页。

3. 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15]。随着佛教的兴盛，皖江流域的佛寺兴建也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虽然经历了唐武宗与周世宗的排佛法难，但域内的佛寺兴建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共建寺庙 293 所（见表 2）。同全国其他地区比较来看，当时皖江流域所在淮南道、江南西道均属于佛寺的次密区，佛寺密度很大，呈现了“网式普兴”的局面^[16]，但还是有一定变化的。就皖江流域本身来看，江南地区的寺院增长的更快，江北地区则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具体来说：其一，寺院密集区分布有明显变化，“泾县密集区”寺院占比（91 所，占比 31.1%）保持了很好的增长速度。“宿松密集区”寺院（42 所，占比 14.3%）占比明显低于三国时期。而“当涂密集区”占比同三国时期相比虽然下降（37 所，占比 12.6%），但涂、泾两地已经同青阳地区联为一体，表明江南地区佛教发展的氛围要明显好于江北地区。虽然江北的庐州地区，也同样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但在整个区域中的地位变化不大。其二，寺院发展仍然很不平衡。隋唐时期平均每县建寺院 9.7 所，从州一级看，滁州、和州所属的各县新建寺院均在平均数以下，而佛教发达的宣州所辖之旌德（7 所），池州所辖之石埭（4 所）新建寺院的数量也低于平均值。从分布看，建寺数低于平均数的县江南地区只有太平、旌德、石埭 3 县，而江北地区则有望江、同安、庐江、慎县、舒城、历阳、含山、乌江、清流、全椒、永阳等 11 个县，这进一步表明了本期皖江流域江南地区的整体佛教氛围要好于江北诸邑。其三，寺院分布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九华山佛寺数量的勃兴。唐以前九华山地区仅有 2 所寺院^[17]，而隋唐时期建寺数量则猛增到 20 所，也使得青阳在新建佛寺的数量上居于诸县之首。九华山的佛教名山之路就是始于此时。

4. 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新建寺院总数为 522 所（见表 3），远超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在皖江流域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本期佛寺分布的基本格局同隋唐时期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新建寺院呈现向州城大邑集中的特征，地区中心城邑的新寺数量远高于该地区的其他县邑。除池州比较特殊外，各州府治所在地的新建佛寺数量都是本地区最高的，如怀宁的新寺（61 所）占安庆府的 48.8%，当涂的新寺（39 所）则占到了太平州的 60%；在佛教相对欠发达的庐州（合肥占 64.7%）、广德军（广德占 81%）、无为军（无为占 85%）等地区这一特征表现的更为明显。而与此相反的是，原来一些新建佛寺较多的地区，则明显落后。如宿松的建寺数在隋唐时期位居舒州第一，但到了宋代则处于安庆府的最末一位了。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传统的寺院密集区在两宋时仍然是佛教发展较好的地区。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两宋时期皖江流域佛教发展的情况。隋唐时期大致形成了“檀主先行奏请，皇帝再赐寺名”的寺院赐额制度^[18]。“赐额”不仅反映了民间对于佛教的推崇，更为关键的是体现了官方对于寺院建设的肯定和重视。两宋时期，皖江流域寺院赐额情况较多，据初步统计，赐额的寺院至少为 124 所，远大于唐代赐额的数量^[19]。各县依次为青阳 20 所，宁国 20 所，繁昌 17 所，泾县 13 所，当涂 13 所，太平 12 所，石埭、铜陵各 5 所，宣城 4 所，建平 3 所，清流、无为、广德、南陵各 2 所，含山、庐江、贵池、芜湖各 1 所。从统计看，宋代赐额的寺院绝大多数不在州城，而多位于佛教发展较早的地区，如青阳、泾县等，这同新建寺院集中在州治附近有明显的不同。新建寺院减少而赐额的寺院大量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这些

地区佛寺已有饱和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历史悠久、屡有“灵验”的寺院逐渐成为官方、檀越以及信众们推崇的圣地，佛教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大量出现的向朝廷“请额”的情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此外，已知赐额的寺院也大都分布在江南，也进一步表明江南地区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力要明显强于江北地区。

表 3 文献所见两宋时期皖江流域新建佛寺分布统计表（单位：所）

路	州府军	县	寺院数
淮南西路（205）	安庆府（125）	怀宁	61
		桐城	22
		太湖	20
		望江	13
		宿松	9
	庐州（31）	合肥	22
		舒城	9
		历阳	10
	和州（17）	含山	5
		乌江	2
	无为军（20）	无为	17
		庐江	3
	镇巢军（12）	巢县	12
		清流	12
淮南东路（29）	滁州（29）	全椒	9
		来安	8
		宣城	40
	宁国府（122）	宁国	24
		太平	23
		泾县	20
		旌德	13
		南陵	2
		青阳（含九华山）	26（24）
		贵池	22
江南东路（288）	池州（86）	东流	11
		铜陵	10
		建德	10
		石埭	7
		当涂	39
	太平州（64）	繁昌	14
		宪湖	11
	广德军（16）	广德	13
		建平	3

二、影响皖江流域佛寺地理分布的因素分析

佛教的传播讲究“机缘”，隋代智顗大师在《四教义》中说“夫众生机缘不一，是以教门种种不同。”^[20]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不仅需要人的“机缘”，显然也受到其他各种“机缘”的影响。不同区域的自然、历史、经济、交通等因素的影响，深刻影响了佛寺的分布。影响皖江流域元以前寺院地理分布的主要因素包括：自然地理条件、交通条件、人口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等因素。

1. 自然地理条件

“自然地理环境是宗教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21]。一个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多种要素，具体到皖江流域，对于佛寺分布影响最大的要素是地形与自然灾害。地形对于佛寺的选址有很大影响，这与佛教的教义关系极大。以禅宗为例，曹洞宗开山之祖洞山良价禅师在《玄中铭》中说：“寄鸟道而寥空，以玄路而该括，然虽空体寂然，不乖群动，……举足下足，鸟道无殊，坐卧经行，莫非玄路。”^[22]禅宗所追求的“玄路”至难险如鸟道、而又“寥空”。道路曲幽、风景秀丽之山林就符合这一情境，自然成为禅宗僧侣修行最喜之地，“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句话，透露的就是这个道理。皖江流域的地貌类型以山丘为主，具备了喜山之佛教传播与发展的自然环境，僧侣们十分喜爱皖江的“奇山”，甚至为了争夺建寺之宝地不惜与道教“斗法”。如今潜山三祖寺的选址过程就颇具代表性：

舒州潜山最奇绝，而山麓尤胜。志公与白鹤道人皆欲之。天监六年二人俱白武帝。帝以二人皆具灵通。俾各以物识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鹤止处为记。志云：某以卓锡处为记。已而鹤先飞去，至麓将止。忽闻空中锡飞声，志公之锡遂卓于山麓。而鹤惊止他所，道人不怪。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识筑室焉。^[23]

宝志通过斗法将菩提庵建在了藏风聚气的谷口凤形山上，后梁武帝赐额“山谷寺”，该寺遂成为禅宗名寺。此外，九华山、浮山、冶父山、琅琊山等山地也是元代以前皖江流域佛寺较为密集的区域。

元代以前的皖江流域是旱涝灾害频仍的地区。已知最早的灾害记录是西汉吕后三年（前 185 年）发生在当涂的大洪水，当时“江水溢，流民千余家”。从东汉至宋末皖江流域共有 80 个年份发生了大的旱灾，102 个年份发生大的洪灾，小型灾害更是多不胜数。“川谷俱竭、饿死甚重”，“水漂田庐、民多溺死”的场景在皖江流域并不罕见。^[24]人类心灵世界的恐惧得不到化解和安抚，转而求助于宗教，这是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缘起的因素之一。为了消除人们的恐惧，达到传播佛教的目的，皖江流域的不少佛教寺院在建立之初就和疏解灾害有关，如区内可考最早的龙澍寺就是因“汉明帝时，求雨有验，敕名”的，以后每当岁旱，人们便来寺内祈祷，并屡有灵验。^[25]再如位于石埭雨台山的海狮庵在当地以“祈雨灵验”而著名。^[26]旱涝灾害多发的当涂甚至将一座大寺叫做“保安南”，并在寺内供奉西峰祖师像，以保一方平安。^[27]九华山地藏信仰中的很多典籍也体现了疏解信众因灾害而造成恐惧的功能，如北宋端拱二年（989 年）常谨所辑的《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就是一例，书中共收集了南朝梁到北宋时期的灵感故事三十二则。^[28]书中所载大多如“居士李思信奉地藏免鬼难记”“唐县李氏家地藏救苦记”之类的宣扬地藏菩萨救人于水火的故事。地藏信仰的流行使得“地藏殿”自宋代开始成为皖江流域佛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必建之神祇。

2. 交通条件

交通条件对于佛教的传播来说影响很大。根据文化扩散理论，佛教的传播一定是伴随着承载者——僧人或信众的迁徙而进行的，交通条件直接关系到佛教的传播与分布状况。如佛教初传时期主要的传法路线周边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寺院，而交通闭塞之区最初佛寺数量稀少。^[29]皖江流域交通条件的最大特殊性在于其便利的水路交通。域内河流众多，湖泊密布，水路交通早在 4000 多年前就与中原沟通。^[30]区内的秋浦河、皖水、泾水、青弋江、水阳江、丹阳湖、巢湖、滁水等水系通过长江与上游的川鄂以及下游的苏沪联成一体，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再加上皖江流域“上控全楚，下蔽金陵，扼中州之咽喉，依两

浙为唇齿”^[31]的地理位置，使得皖江水路成为佛教文化传播的天然廊道。元代以前，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使得皖江流域不仅成为佛法传输的通道，而且成为佛法重要的传播地。两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文化廊道的功能体现的最为明显，当时皖江流域处于佛教鼎盛的建康、庐山、寿春之间，而僧侣们游锡往来三地必假道于皖江流域，对此严耕望先生有总结性论述：

什公卒后，关中亦乱，徒众先后四散，道融、僧嵩至彭城，卑摩罗叉、僧导至寿春，道生早已过江，慧叡、慧观、慧严、僧业亦至建康，至建康者多经庐山。在彭城、寿春者亦多来往建康。则散处方向以江淮为多。^[32]

高僧的游锡往来，极大的促进了区域内的佛寺建构，在毗邻建康和庐山的地区分别形成了“当涂密集区”和“宿松密集区”。而彼时皖江流域中部及南部山区的寺院数量则较为稀少。隋唐时期，随着水上交通体系的完善，新兴的港埠周边兴建了很多的寺院，以长江干流为例，采石渡属地当涂建寺 20 所，“鹊头镇”港属地南陵建寺 25 所，“皖口”港属地怀宁建寺 11 所。^[33]特别是采石渡，当时素有“古来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之称，人员来往频繁，佛法鼎盛，南唐时期曾有僧人凿石为窍，建石浮屠。^[34]而石窟造像在皖江流域是极为罕见的，水路交通对于佛教传播的促进作用可见一斑。再如池州，由于水运的兴盛，隋代置秋浦县，唐时将秋浦、青阳、石埭、至德等四县划归池州管辖。水运的发达，不仅使得客商的频繁往来，促进了池州的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如金地藏本人就是通过水路“落发涉海，舍舟而徒”驻锡九华的。可以说便利的水路交通、九华山自身的奇秀山林再加上大方布施的檀越，最终促成了九华山建寺的第一次高峰。此外，长江支流通航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太湖、合肥、太平、泾县、怀宁、巢县等地新建寺院数量也都很大。

3. 人口条件

佛教发展与否，最终是要看信众的多寡。佛教要发展信徒，壮大势力，必须向人口稠密的地区发展。佛教的地理分布与人口分布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35]元代以前皖江流域的人口总体上来说是不断上升的，其中人口的被动迁徙是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规模的迁徙主要有三次：其一是永嘉南渡。“自中原乱离，遗黎南渡”^[36]，冀、豫、青、并、兖、徐等地区人口大量流入江淮地区，到刘宋泰始年间迁入的总人口多达 17 万^[37]，极大地改变了全流域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大明六年（464 年）为例，当时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是扬州宣城郡，因其是“永嘉东迁，衣冠违难多所萃止”^[38]之所，流入人口较多，人口总数达到了 47992 人。其余地区人口数依次为淮南郡 25840 人、南汝阴郡 19585 人、历阳郡 19470 人、新昌郡 15396 人、庐江郡 11997 人、晋熙郡 7497 人。^[39]寺院分布也基本上同人口分布成正比（见表 1）。只有晋熙郡（辖地大体位于今安庆市）例外，该郡人口最少，但建寺数量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却是全区最多的。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地理因素。晋熙郡一带“其山阻以深、其水揣以激，其邑居漱以隘。”^[40]但同时又处于“东接太望，西界蕲黄，北通英霍，南滨大江”^[41]的四通八达之地，是当时北方人民南迁的通道之一。同时天柱山、司空山等地符合“佛者觉也，以明性为体，以觉世为用，动静无二，隐显如一”^[42]的境界，自然对于佛教徒有很大的吸引力，来往的僧人和信众在此地建寺传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二，该郡长期受到以何充家族为代表的世家奉佛之风的影响，佛教氛围浓厚。门阀政治是东晋时期的一大特色，名门望族的信仰对社会影响很大。何充为庐江潜人，何氏家族在这一地区多有奉佛行为，如今三祖寺即为何氏三高（何求、何点、何胤）故宅，后何氏舍宅为寺。^[43]此种重量级的布施对于当地民众的影响可想而知。

第二次人口大迁徙是由安史之乱引起的。唐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史乱发，出现了“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44]的人口流动，长江沿线聚集了数量最多的移民，池州、宣州成为移民的主要居留地之一。^[45]，两州明确建于安史之乱以后的寺院数量为 104 所，而在隋唐五代时期池、宣两州一共才建寺 182 所，人口的大量流入对于两地佛教发展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第三次被动迁徙是起因于靖康之乱。这次大迁徙出现了“在京衣冠、士族、百姓、诸军夺门南奔者数万，流涉于江淮之间”^[46]的场景，使得皖江流域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以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 年）为例，当时流域内各地的人口密度：滁州所在淮南东路每平方公里 7.4 人，安庆府、庐州、无为军、和州所在淮南西路每平方公里 8.4 人，池州、广德军、

太平州、宁国府所在江南东路每平方公里 27.9 人，而南宋全国的人口密度则为每平方公里 16.4 人^[47]。因此，江南东路是南宋时期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所建佛寺的数量同样很大。

皖江流域佛寺随着人口的增多而增多，一方面是因为人口的增加使得佛教有了更为雄厚的信众基础。同时，战争等人祸所造成的被动迁徙对人心理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心理困苦是一致的。由于宗教可以疏解人们的痛苦，迁徙的人们更容易信仰宗教，陈垣先生就说：“人当得意之时，不觉宗教之可贵也，惟当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则每思超现境而适乐土，乐土不易得，宗教家乃予以心灵上之安慰，此即乐土也。故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归依者愈众，宗教者人生忧患之伴侣也。”^[48]如东晋早期的芜湖是江南地区移民较为集中的地区^[49]，上党人聚集的芜湖在东晋时期建寺 3 所，排名在整个皖江流域是比较靠前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晋以前虽然芜湖靠近佛教鼎盛的当涂，但却不见一寺。这从侧面印证了陈垣先生所说非虚。由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天灾人祸而造成的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区，往往成为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类宗教快速发展的地区。

4. 经济条件

佛教的根本思想是“空”，大乘佛教的核心经典《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开篇即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但佛教终究还是社会的宗教，它无法脱离物质基础而超然物外。经济条件对于佛教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在佛陀时代，僧人不事生产，维持生命依靠托钵乞食，最早的皈依释迦的陈如等五人就号称五比丘，而比丘就是“上从如来乞法以炼神，下就俗人乞食以资身”^[50]之意。佛教传入中土后，由于文化的差异，沙门们无法通过乞食而生存，因而佛教早期传法活动所需的物质基础大多来源于社会上层人士的布施。东汉时期楚王英就将明帝所还的缣帛用“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51]，皖江人士笮融在徐州“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52]因而，佛寺的建设首先离不开豪门大家甚至皇族的布施，特别是在佛教发展早期，在皖江流域这一点表现的也十分明显。三国时期康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53]，通过努力取得了孙权的支持，并为其建了三座寺院^[54]，其中“姑孰之化城，基址最广”^[55]。再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泾县之“崇庆寺，亦在水西。南齐永平元年建，相国淳于棼舍宅，始名凌岩”^[56]。以及唐代九华山化城寺的兴建过程等^[57]，可以说社会上层的布施是元代以前皖江佛寺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来源。

其次，一个地区自身经济条件的好坏对佛寺的建设影响也很大。由于建寺所耗甚大，“营造寺观……大则耗费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已上”。^[58]一般来说，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建设兴建或修葺佛寺的可能性更大些。如吴琢在《吉祥寺记》中所载芜湖寺庙之兴衰就体现了地区经济的重要性：

大江之东芜湖，古为名邑。因地之胜，因民之富，凡所创建，雄伟独异他处。而佛刹又为人所敬信，一有兴作，趋之者众，故成功尤易焉。县西五里有寺，旧名永寿院。晋永和二年建。僧绍熙焚巢毁像，扫地几尽。继得僧自元勉力修葺，而院中兴。……元之徒曰可旻，亦有道行，俗缘能继守前业。旻死，其弟可云、可暹败坠寺居，略如绍熙。适有宣州广教禅院僧庆余，以元丰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来就法席，慨然有志兴复。日走于市，始自一钱而乞之，人有施钱四十万者，故岁行八周，兴旧起废，蔚为禅居。^[59]

吉祥寺自肇建以来多次隳堕，也多次修复，宋时僧庆余为复寺而募化，檀越竟有施钱四十万者，以至于他用很短的时间就使寺院“兴旧起废”了。如果地区经济水平不佳的话，修葺寺庙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总体来说，元代以前，随着中国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没有经历大战乱的皖江流域，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经济也较为富庶，如《宋史》对今安庆地区有“土壤膏沃，人性清杨，善商贾，邻里富庶”^[60]的描述。再如当涂更是有“繁华古今称最”^[61]的美誉。良好的经济条件使得元代以前的皖江流域拥有极好的发展基础。

再次，禅林制度的确立进一步扩展了皖江流域佛寺的分布范围。皖江流域的天柱山和司空山一带是禅宗的发轫之地。专家

指出，南北朝时期，禅宗三祖僧璨一直在天柱、司空两山附近过着随缘而化的头陀行者生活，这对摄化学众是极为不便的，这也是早期达摩禅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62]农禅结合的经济方式一直到隋初四祖道信在黄梅双峰山聚徒传法后才初露端倪，后四祖传弘忍，忍传慧能，慧能再将禅法发扬光大。可见稳定的禅居环境成为传法的重要基础。农禅结合形式的积极倡导者首推马祖道一，他广置禅林并始行农禅合一。其门徒开始分散在各处山区，创建禅林，聚徒传法，并自耕自养。^[63]山谷寺作为禅宗胜地，道一也曾来朝圣拜谒，其行脚处后建有马祖庵^[64]。洪州门下三大士之一的南泉普愿禅师则是皖江流域实践农禅合一的典型代表，乾隆《池州府志》记载：

普愿和尚，姓王，新郑人。初，六祖授法南岳让，让授马祖。而愿与西堂、百丈，马祖门下三大士也。唐贞元十一年，愿憩锡贵池之南泉，自建禅斋，不下山三十余载，宗风大振。若赵州从谏、长沙景岑、鄂州茱萸、白马昙照、甘贄行者、香严义端等不下千人鳞集南泉。愿寂后，散居四方丛林。^[65]

南泉通过禅农合一达到了自给自足，他圆寂后其千余人的法嗣散居四方，而这些法嗣所建之寺，也大多采取禅农合一的经济制度。如果说百丈怀海禅师在制度上确立了禅林制度，而普愿则是禅林制度的第一实践者，其对禅宗的发展和禅宗寺院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禅林制度的实践与成熟，使得禅宗能够在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山区，在缺少布施的情况下较好的生存和发展。唐以后，皖江流域的丘陵和山地间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禅林寺院，表明佛教进一步向自然与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传播。

5. 政治及其他因素

政治因素对于佛教的影响极为巨大，如前所述皖江流域的佛教就是滥觞于楚王英的左迁。元代以前皖江流域长期处于南北政治势力交替叠加影响的区域，也长期处于大一统王朝的统治之下，这使得皖江流域佛教的发展有其自己的特点：

其一，皖江流域在较长的时间内处于京畿要地。从东吴迁都建业开始到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短暂时期外皖江流域一直靠近政治中心区域，而“政治中心往往就是佛教中心，其政治地位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佛教兴旺的程度”^[66]。从皖江流域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分布来看也符合这一特点，临近建业的皖江流域诸邑所建佛寺的数量都不少。南宋时期，皖江流域诸邑或在京畿范围内，或临近京畿。因此，建寺数量与其政治地理位置成正比。以与临安府接壤的宁国府为例，宋代宁国府建寺数为122所，其中明确建于北宋的寺院有29所，而建于南宋时期的则达到60所，南宋时期的建寺数量远远超过北宋。

其二，政区密度的不断增大，这也是佛寺数量增长的一个原因。如唐中期皖江流域共有6州25县，到了两宋时期就发展到10州（府、军）33县，政区密度两宋较之唐中期州府一级增加了66%，县一级增加了32%，随之而来的是佛寺数量在区域政治中心的快速增长。

其三，战争因素对于皖江佛教发展影响较少。元代以前发生在皖江流域较大规模的战争较少，南北王朝对峙时的拉锯地区大多位于江淮之间。只有在南北朝、五代十国末期的短暂时期内，皖江流域一度成为南北政权对峙的前线，即便如此，这一时期皖江南岸地区佛寺仍有一定的发展，据统计五代时期建寺为23所，其中就有20所建于相对和平安定的江南地区。此外，皖江流域不仅成为人口迁移的区域，而且也成为僧人避难之所，佛教的稳定发展态势要好于兵燹频繁的北方。

除政治因素外，道教的发展对于佛教的地理分布也多有影响。皖江流域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成为佛道两家竞争的场所，而道教在皖江的发展则早于佛教，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封天柱山为南岳时就立有五岳祠，并驻有专门的方士。天柱山一带也就借势成为我国道教早期的兴盛区域之一。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天柱山附近地区道教的强势，是造成这一地区成为佛教传播“蛮区”重要原因。

以上讨论只是透过寺院的地理分布情况对皖江流域佛教地方化的状况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和梳理，区域佛教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高僧、佛教学术、檀越等其他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详见洪修平:《从佛教中国化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4期。

[2]主要参见严耕望、汤用彤、张弓、张伟然、李映辉、介永强、王开队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3]目前涉及皖江流域佛寺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全国性研究涉及到皖江流域佛寺的主要有张弓的《唐代佛寺群系的形成及其布局特点》(《文物》1993第10期)、李映辉的《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版);研究安徽佛教涉及到皖江流域佛寺的主要有:李霞的《安徽区域佛教的发展与传播》(《池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研究皖江流域佛教文化涉及到佛寺主要的有:李霞的《九华山佛教传播中心与文化特质形成及现代意义》(《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李霞的《论皖江佛教传播中心与文化特质的变迁》(《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卢忠帅的《明清九华山佛教文化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王开队的《历史宗教地理学视阈下九华山佛教文化体系的建构——以寺院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3期)、王开队等的《明代青弋江流域佛教系统初探——以寺院时空分布为中心》(《安徽史学》2017年第3期)等。现有成果呈现出研究唐代、明清时期的较多,探究其他时期的少。研究整体佛教文化的多,专题研究皖江流域寺院地理分布的少。研究九华山佛教的多,关注皖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基本特点。

[4]参见周运中:《苏皖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绪论”第一节,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5]历史宗教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参见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绪论部分有关论述。

[6]本文参考的地方志资料如下:清康熙《江南通志》卷47《輿地志·寺观五》、清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57《輿地志·坛庙》、明泰昌《全椒县志》卷3《综幽志·寺观》、民国《全椒县志》卷14《宗教志·释教》、明嘉靖《太平府志》卷11《两教志·寺观》、清乾隆《太平府志》卷14《古迹志》、明嘉靖《宁国县志》卷2《宫室类·寺观》、民国《宁国县志》卷1《輿地志下·寺观》、清雍正《建平县志》卷20《仙释》、清同治《浮山志》卷2《建置》、清嘉庆《庐州府志》卷19《寺观志》、清嘉庆《合肥县志》卷14《古迹志》、明万历《滁阳志》卷9《寺观》、清康熙《滁州志》卷18《坟墓》、清光绪《滁州志》卷10《方外志·寺观》、清嘉庆《宁国府志》卷14《营建志·寺观》、民国《南陵县志》卷11《营建志·寺观》、清顺治《巢县志》卷14《祀典志·宫观院寺庵》、清嘉庆《泾县志》卷25《寺观》、民国《九华山志》卷3《梵刹门》、明正德《安庆府志》卷30《方技传》、清康熙《安庆府志》卷4《地理志·寺观》、清同治《太湖县志》卷6《輿地志六·寺观》、清嘉庆《舒城县志》卷31《古迹》、清光绪《续修舒城县志》卷10《輿地志》、清康熙《石埭县志》卷3《建置志·寺观》、民国《石埭备志汇编》、清康熙《潜山县志》卷6《古迹·寺观庵祠》、清乾隆《当涂县志》卷13《祠祀》、清宣统《建德县志》卷9《祠祭志·寺观》、民国《太平县志》卷3《寺观》、清嘉庆《太平县志》卷8《寺观》、清康熙《含山县志》卷14《古迹》、清道光《宿松县志》卷5《輿地志五·寺观》、清道光《繁昌县志》卷4《营建志·寺观》、清光绪《直隶和州志》卷5《坛庙》、民国《芜湖县志》卷41《庙祀志·寺观》、清康熙《庐江县志》卷8《古迹》、清光绪《庐江县志》卷16《杂类·寺观》、民国《冶父山志》卷2《建置》、清光绪《广德州志》卷14《营建志·寺观》、清道光《来安县志》卷2《营建志·坛庙》、清嘉庆《无为州志》卷4《輿地志四·庙寺》、清光绪《宣城县志》卷10《祠祀》、清光绪《青阳县志》卷12《外志·寺院》、明嘉靖《铜陵县志》卷2《建置篇·寺观》、明万历《铜陵县志》卷2《建置志·寺观》、清乾隆《铜陵县志》卷5《庙宇》、清嘉庆《旌德县志》卷4《典礼·庙宇》、清道光《旌德县续志》卷2《建置·庙宇》、清康熙《桐城县志》卷6《古迹志》、清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4《营建志·寺观》、清嘉庆《东流县志》卷17《古迹志》、清乾隆《望江县志》卷2《地理·寺观》、清光绪《贵池县志》卷9《輿地志·寺观》、民国《怀宁县志》卷9《祠祭》、民国《怀宁县志补》补3《寺观》、明嘉靖《池州府志》卷3《建置篇·寺观》、清乾隆《池州府志》卷58《方外传》、清康熙《黄山志定本》卷2《建置志》,以及现代《黄山志》第4篇《宗教·佛教》、《九华山志》第3篇《寺院》、《天柱山志》卷4《营建存废录·寺庙》、《琅琊山志》第4章《宗教·佛教》、《浮山志》第4章《佛教·寺庙》、《司空山志》第3章《人文景观·寺观庵堂》、《滁州市民族宗教志》

[7]参见周尚意等：《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章的有关论述。

[8]《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传》。

[9]据严耕望先生考证，至汉末长江流域有佛法传入的地区有3处，按传入时间依次是丹阳（泾县）、广陵及会稽。参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0]据文献所载，东汉时期泾县应建有两寺：一是汉明帝时期的龙澍寺（建寺应在71-75年之间），二是汉顺帝时期（115-144年）僧人僧灵寿所建之万寿寺。参见李德淦、洪亮吉：《嘉庆泾县志》卷25《寺观》，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134、1137页。

[11][16]张弓：《唐代佛寺群系的形成及其布局特点》，《文物》1993年第10期。

[12][32]参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8、26页。

[13]“密集区”均以核心地区命名。

[14]历史上南陵县治及辖区变化很大。今南陵县境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大体位于宣城郡宣城县辖区内。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南陵县境大部分位于今池州、繁昌一线。直到南唐保大九年（951年），今南陵县才大体定型。参见《安徽省志·建置沿革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569-572页。

[15]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7]学界对于九华山佛寺始于何时尚有争议。主要观点有“东汉说”、“东晋说”和“唐末说”（具体参见卢忠帅：《明清九华山佛教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章第二节；王开队：《历史宗教地理学视阈下九华山佛教文化体系的建构》，《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5期）。已有的讨论，学者们似乎忽略了以下两个细节：一是“东晋说”中化城寺的创建者杯渡（又称杯度）的游锡经历。据慧皎《高僧传》卷10《神异下·宋京师杯度》（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1—595页）记载，他曾数次往来建康等地，而建康相去九华山并不远。此外，皖江流域地方志中也多处记载了杯渡的活动，除青阳地区外，其在宛陵（今宣城）也有建寺记载，（参见《乾隆太平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在铜陵有驻锡的记载，（参见《乾隆铜陵县志》卷13《列传·仙释》，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316页）。虽然关于杯渡的记载有一定的神异色彩（这也是佛教徒弘扬佛法惯用的手段），但杯渡在皖江流域游锡的经历，应该是有一定可信度的。而且，东晋南北朝时期江南佛教发展很快，九华山地区建一茅庵也未必不可能。二是潘桂明先生在《九华山佛教史略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中提到清人周赞认为：“南朝四百八十寺，至萧梁始盛。晋时，江南自东林而外，梵宇寥寥。九华山顶，棒莽未开，安得有寺？”而周赞本人却是一个“辟佛”者，他在《东崖夜怀古二首》中曾写到“瓣香仰止陵阳路，自比蚩氓念佛衷”。“蚩氓”（蚩蚩氓）一词用来指敦厚而愚昧的人，在《九华半宵亭山神庙碑记》中则认为佛教“竭民膏脂，以起金碧辉煌之塔院，已大与佛性相反而谓佛，更欲强屈夫诚实不空者以隶此空空之门下，不亦妄乎！”（以上两则史料分别参见《光绪青阳县志》卷10《艺文志》、卷12《外志》，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803、957页）。由于立场的关系，一位辟佛的学者在编辑志书时对佛教的历史有一点否定之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东晋南北朝时期九华山很有可能已有寺院（茅庵）的踪迹，因此本文采用县志所载的寺院数。至于这两座寺院是不是唐代化城寺的前身，目前还未见十分可信的资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18]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8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19]据统计，唐代赐额的主要寺院为九华山的永留寺、慈仁寺、潜山山谷乾元禅寺、泾县的白云院、宁国的崇福教寺等。五代时期赐额的主要寺院有黄山的翠微寺、清流的龙兴寺等。唐宋赐额的寺院应远不止这个数量，由于地方志撰修标准不统一，限于资料，本文也只能做一个初步的梳理，但仍能大体反映当时寺院赐额的基本情况。

[20]智顗：《四教义》卷1《新修增补大藏经·中观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1]李悦铮：《试论宗教与地理学》，《地理学报》1990年第3期。

[22][50]丁福保：《佛学大词典》，台北华藏净宗弘化基金会2015年版，第1940、729页。

[23]朱棣：《神僧传》卷4，明永乐十五年内府刻本。

[24]有关灾害年份的统计见翟全武：《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安徽卷》，气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25]洪亮吉等：《泾县志》卷25《寺观》，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137页。

[26]张士范等：《池州府志》卷11《石埭·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7]《乾隆太平府志》卷14《古迹志·寺观》，《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8]参见张总：《地藏信仰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9页。

[29]参见介永强：《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9页。

[30]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交通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31]穆彰阿、潘锡恩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08《安徽统部》，上海书店1985年版。

[33]隋唐时期皖江流域港埠情况详见周怀宇：《隋唐时期安徽水运交通新格局考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34]李恩绶：《采石志·艺文》，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20页。

[35][66]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304页。

[36]《晋书》卷15《地理志下》。

[37]参见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人口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38]洪亮吉：《宁国府志》卷9《风俗》，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900页。

[39]徐州新昌郡共领7县，其中顿丘、谷熟等侨县位于今全椒县境内，以上数据为新昌郡全部人口数。

[40]郑敦亮、邬正阶：《宿松县志·旧志序》，黄山书社 2011 年版，第 15 页。

[41]郑敦亮、邬正阶：《宿松县志》卷 2《舆地志一·形势》，黄山书社 2011 年版，第 12 页。

[42]郑敦亮、邬正阶：《宿松县志》卷 25《艺文志一·重兴东禅寺碑记》，黄山书社 2011 年版，第 560 页。

[43]乌以凤：《天柱山志》，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5 页。

[44]李白：《永王东巡歌》，见彭定求：《全唐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93 页。

[45]详见周振鹤：《学记一十九》，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4、120 页

[46]庄綽：《鸡肋编》卷上，《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二》，清乾隆刻本。

[47]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64 页。

[48]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 6《乱世与宗教信仰第十七》，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85 页。

[49]《晋书》卷 15《地理志下》载：“是时上党百姓南渡，侨立上党郡为四县，寄居芜湖”。

[51]范曄：《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922 页。

[52]《三国志》卷 49《吴书四·刘繇太史慈士燮传》。

[53]释慧皎：《高僧传》卷 1《译经上·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 页。

[54]据乾隆《太平府志》卷 M《古迹志·寺观》载：“吴大帝时康里国僧持佛塔一座过江，时初建佛院，一为秣陵之长干寺、一为海盐之金粟、一为姑孰之化城基址最广。”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7）》，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7 页。

[55]姑孰位于今当涂县境内。

[56]洪亮吉：《宁国府志》卷 14《营建志·寺观》，黄山书社 2007 年版，第 1126 页。另南齐无“永平”年号，应为“永明”。

[57]详见德森：《九华山志》卷 6《檀施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3 年版，第 228 页。

[58]《旧唐书》卷 88《韦嗣立传》。

[59]余谊密、鲍实：《芜湖县志》卷 41《庙祀志》，黄山书社 2008 年版，第 287 页。

[60]张楷：《康熙安庆府志》卷 6《民事志·风俗》，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188 页。

[61]朱肇基：《当涂县志》卷7《风俗》，清乾隆刻本。

[62]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63]详见张弓：《唐代禅林经济简论》，《学术月刊》1987年第9期。

[64]张楷：《康熙安庆府志》卷4《地理志·寺观》，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5页。

[65]张士范：《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50页。